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岳麓书社

湖南教育史

第二卷 (1840—1949)

总 编 冯象钦 刘欣森

本卷主编 周秋光 莫志斌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岳麓书社

湖南教育史

第二卷 (1840——1949)

总 编 冯象钦 刘欣森
本卷主编 周秋光 莫志斌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时期的湖南教育(1840—1894 年)	
.....	(1)
第一节 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时期湖南的传统教育	(1)
一、传统教育的发达	(1)
二、举业教育及其教学内容	(5)
第二节 湖湘经世学派对传统教育流弊的批判	(16)
一、湖湘大地的经世学风	(17)
二、贺长龄、魏源、汤鹏对传统教育流弊的批判 ...	(19)
三、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对传统教育流弊的批判 ...	(39)
四、王闿运的教育思想	(52)
第三节 传统教育的改革与新式教育的萌芽	(55)
一、湘水校经堂的实学教育	(55)
二、朱其懿与沅水校经堂	(65)
三、湘人对新式教育的探索	(77)
四、其他新式教育	(86)
第二章 维新变法时期及政变后的湖南教育(1895—1900 年) ...	(91)
第一节 近代教育的开端	(92)
一、学政江标提倡新学	(92)
二、谭嗣同与浏阳算学社	(100)
三、湘乡东山精舍的创办	(110)
第二节 湖南时务学堂	(117)

一、时务学堂创立的经过及其原委	(117)
二、时务学堂的管理体制及教学内容与方法	(121)
三、围绕时务学堂展开的斗争	(126)
四、时务学堂的结局与影响	(130)
第三节 各地新式学堂与学科的涌现	(133)
一、陈宝箴改求贤书院为武备学堂	(133)
二、全省各地新式学堂的兴起	(139)
三、各地书院新式学科的增设	(150)
第四节 戊戌后近代教育的顿挫	(161)
一、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教育界斗争的实质	(161)
二、戊戌政变后的湖南教育	(166)
三、政变后趋新特色得以维持的原因	(172)
第三章 清末新政时期的湖南教育(1901—1911 年)	(176)
第一节 新学制的建立与传统教育的解体	(177)
一、长沙人张百熙与新学制的建立	(177)
二、改书院为学堂	(184)
三、新式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立	(190)
四、湖南的兴学热潮	(194)
第二节 师范教育的崛起	(197)
一、选派学生赴日学习师范及留日运动的兴起 ..	(198)
二、创办省城师范馆	(203)
三、设立中、西、南三路师范学堂	(205)
四、建立优级师范学堂	(213)
第三节 中小学办学体系的形成	(217)
一、官立、公立和私立中学堂	(217)
二、教会中学堂	(226)
三、小学堂	(229)
四、湖南中小学教育发展迅速的原因	(236)

第四节 高等教育和实业教育的兴起	(239)
一、高等教育	(239)
二、实业教育	(246)
第五节 其他教育的兴办	(253)
一、幼儿教育	(253)
二、识字教育	(258)
三、女子教育	(260)
第四章 民国初期的湖南教育(1912—1919 年)	(263)
第一节 教育体制的改革	(264)
一、教育行政制度的演变	(264)
二、各项教育新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286)
第二节 教学革新与师资建设	(308)
一、教学内容的革新	(308)
二、教学方法的探索与更新	(315)
三、师资队伍建设	(321)
第三节 高等、中等教育的发展	(336)
一、高等教育	(336)
二、中等教育	(345)
第四节 初等、幼儿及女子教育的发展	(361)
一、初等教育	(361)
二、幼儿教育	(368)
三、女子教育	(371)
第五节 留学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发展	(374)
一、留学教育	(374)
二、社会教育	(382)
第五章 清末民初湖湘大地的教育思潮与学生运动	(389)
第一节 传播教育思想的载体	(390)
一、主要的教育社团组织	(390)

二、传播近代教育思想的报刊杂志	(402)
第二节 流传湖南的主要教育思潮	(414)
一、军国民教育思潮	(415)
二、实业教育思潮	(427)
三、国民教育思潮	(436)
第三节 湖南的学生运动和风潮	(445)
一、清末湖南的学运和风潮	(447)
二、民国初年湖南的学运和风潮	(472)
第六章 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时期的湖南教育(1919—1927 年)	
.....	(482)
第一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湖南教育界	(483)
一、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兴起	(483)
二、新民学会、健学会及其他教育团体、教育刊物的风行	(490)
三、湖南教育界的驱张运动	(497)
四、杜威等人来湘讲学	(503)
第二节 各种教育新思潮在湖南的传播与实践	(509)
一、工读主义思潮、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以及开发南洋的教育实践	(509)
二、平民教育思潮在湖南的传播与实践	(520)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干部学校	(538)
第三节 壬戌学制的颁行和湖南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	(547)
一、壬戌学制的颁行	(547)
二、壬戌学制颁行前后湖南学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	(550)
第四节 北伐战争时期湖南教育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	(556)
一、反帝反封建革命形势的高涨	(556)

二、反对文化侵略,维护教育主权	(565)
三、反对军阀赵恒惕的反动统治	(570)
四、大力支援北伐战争	(577)
第五节 在革命形势推动下湖南省政当局的教育革新 举措	(581)
一、教育行政的改革	(581)
二、多方筹措教育经费	(586)
三、提倡与普及平民教育	(595)
第六节 北伐战争时期湖南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	(600)
一、小学教育的蓬勃发展	(601)
二、中等教育的曲折发展	(607)
三、湖南大学的成立	(613)
四、工农教育的勃兴	(618)
第七章 五四前后湖南教育界的璀璨群星	(632)
第一节 杨昌济的教育思想	(632)
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633)
二、教育思想	(637)
第二节 徐特立的教育思想	(647)
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647)
二、教育思想	(652)
第三节 青年毛泽东的教育观	(661)
一、求学与早期的革命活动事略	(661)
二、教育活动	(665)
三、早期教育思想	(668)
第四节 罗辏重与陶龛学校	(675)
一、陶龛学校的创办	(675)
二、陶龛学校的办学特色	(676)
三、罗辏重的“素养教育”思想	(679)

第五节 其他教育名人的教育思想与业绩	(683)
一、陈润霖与楚怡学校的教学改革	(683)
二、易培基与第一师范的教学改革	(687)
三、胡元倓与明德中学	(691)
四、朱剑凡与周南女中	(694)
五、曾宝荪与艺芳女中	(697)
六、何炳麟与岳云中学	(700)
七、其他教育名人的教育活动	(702)

第八章 国共两党内战时期的湖南教育(1927—1936 年)

.....	(706)
第一节 何键主湘与封建教育沉渣泛起	(706)
一、明令停学整顿,反对革命教育	(707)
二、鼓吹固有道德,提倡尊孔读经	(714)
三、实施“特种教育”,进行反共宣传	(721)
四、教育界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	(725)
第二节 学校教育的发展	(730)
一、初等教育	(731)
二、中等教育	(738)
三、高等教育	(750)
第三节 社会教育的长足进步	(755)
一、社会教育机构的变迁与发展	(757)
二、民众学校的迅猛发展与民众识字运动的勃兴	(761)
三、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健康教育的推行	(765)
四、戏剧的改良以及广播电影事业的发展	(769)
第四节 湘西特区师资训练所的设立	(772)
一、湘西民族教育之状况	(772)
二、湘西民族教育的改进与师训所的设立	(774)
第五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湘省革命根据地的教育	(776)

一、红军教育	(778)
二、干部教育	(781)
三、社会教育	(784)
四、普通学校教育	(787)
第六节 九一八事变以后湖南教育界的抗日救亡运动	(791)
一、组织救亡团体,掀起抗日救亡宣传的热潮	(791)
二、开展深入持久的抵制日货运动	(794)
三、捐钱出力,支援前线抗战	(795)
四、“一二·九”运动和湖南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798)
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教育(1937—1945 年)	(802)
第一节 抗战初期湖南的战时教育	(802)
一、张治中的战时民训和军事教育措施	(803)
二、张治中的湘西出巡与教育改革	(810)
第二节 湖南教育在炮火声中发展	(814)
一、长沙“临大”和其他省外迁湘学校	(814)
二、廖世承与国立师范学院	(824)
三、高等教育的艰难发展	(831)
四、各级各类教育的增加与布局	(840)
五、朱经农与湖南教育	(847)
第三节 教育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	(859)
一、湖南的抗日宣传活动	(859)
二、爱国师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865)
三、举办战时学校,培训抗日干部	(873)
第十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湖南教育(1946—1949 年)	(880)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湖南教育事业的恢复	(881)
一、教育复员措施	(881)

二、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888)
第二节 内战爆发与湖南教育的危机	(901)
一、内战爆发时的湖南形势	(902)
二、湖南教育面临的严重危机	(907)
第三节 教育界的爱国民主运动	(911)
一、国民党政府对爱国师生的迫害	(911)
二、教育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916)
三、广大师生的“迎解护校”斗争	(921)
后 记	(928)

导 言

本卷论述的是 1840—1949 年湖南传统教育的转型以及湖南近代教育的产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湖南近代教育从何时发端？1840 年鸦片战争的发生是中国历史进入近代的标志。此后 20 多年内京师和沿海省份相继举办了一些近代学校如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等。而湖南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条件，使得它在鸦片战争发生后的 50 年内，仍然深闭固拒，拒绝学习西方，与沿海省份相比较，它在近代化实质性的起步上至少晚了 30 多年。

教育属于文化的范畴。考察近代教育的发端，应与考察近代文化的发端联系起来。而考察近代文化的发端，我们依照的标准应是以西方文化的输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融汇作为标志。进而言之，倘若仅有西方文化的输入而没有对于这种文化的受容，那还不足以表现文化近代化的特征，只有当两种异质的文化彼此冲突融汇，原来的文化在此中发生变异，不再全部保持原来的面目，而是朝向新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才能意味着近代文化的开始。运用这个标准审视湖南文化，就会发现湖南近代文化的起点是在甲午战争之后。

首先，从中西文化冲突融汇的视角来看，甲午战前的湖南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基本上只有排斥，没有受容。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西教加以排斥。从 1860 年开始，只要湖南有传教

士涉足之处,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反教排外事件。据统计,在甲午战前,湖南发生的大小教案多达数十起,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① 二是对于西方的一切新事物和新观念也一概加以排斥。这里可以略举两例:一是湘省内河行轮。早在 1866 年,湘阴人郭嵩焘就上书总理衙门,主张仿西方技艺,在湘省制造火轮,以分洋人之利。1879 年郭出使英国卸任归里,即筹资创议行轮于湘、鄂间。没想到此举竟遭到了湖南人的极力反对,说是一旦开通了湘、鄂间的行轮,不仅会招引洋人大批地进入内地,而且那些依靠民船运输为业的江河船户,也会因之而生涯尽失。故众口一词,指郭为“二毛子”,同官刘锡鸿还上奏弹劾,致使郭议败于垂成。直到甲午战后,其他一些海河交通之区,如苏、浙、赣等省,早已兴办内河行轮了,而当湘绅向湖广总督张之洞作恳切请求时,张仍以“湘省风气未开,易滋事端”为词,不予批准。^② 二是 1872 年 6 月,曾国藩病歿金陵,其柩由轮船运抵长沙,官绅大哗,反对轮船入境。以曾国藩为清朝中兴名臣、湖南显宦,湖南人尚且如此对待,可见其守旧观念到了何等程度。这种观念和气氛,甚至到了甲午战前的两年尚未减弱。据载:1892 年,湘鄂间架设电线,竖电杆,澧州绅民疑电线为洋人所设,群起反对,将电杆毁折,终于迫其停工。^③ 故在西方传教士心目中,湖南好比《圣经·创世纪》中一再提及的“铁门之城”——伊塔——一个拒绝文化洗礼熏陶的地方,认为湖南之于中国,有如拉萨之于西藏,是禁地中的禁地,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④

①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3 年版,第 106 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一八,中国书店 1990 年版,第四册,第 848 页。

③ 《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二次修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1 页。

④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3 年版,第 109 页。

其次,从文化的各个层面看,甲午战前的湖南文化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异,仍属于封建的传统文化形态。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仅指观念形态,广义的文化则包括物质的、制度的、社会心理的三个层面。物质文化是文化的表层结构,它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相联系,包括物质或器物的创造。可是在甲午战前,湖南没有出现任何资本主义的新式工、矿、交通、邮电等设施,社会经济依然故我。人们的物质生活及其环境,基本没有改变。社会心理文化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它反映人们的内心生活、观念形态及其社会习俗,可是在甲午战前,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其社会心理,对于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完全表现出排斥和抗拒的态度。在学术、文艺、史地等各精神文化领域的建构,依然没有脱去传统的规范。士大夫多崇尚心性理学,或沉湎于考据训诂。虽然有一部分人倡导经世致用,这本来可以成为中西文化的一个汇合点,但由于人地所限,以及对于西方文化的拒不受容,所谓经世之学,也依然不能突破儒学的藩篱。至于思想的传播工具及其各项辅助设施,诸如近代化的新闻、出版、印刷及其公共图书事业,也一概全无。介于物质与心理文化之间的是制度文化,它反映人们的集体生活。可是在甲午战前,社会各项制度也丝毫未曾注入资本主义的新鲜血液。以教育一项论,除了部分经世派对于科举制度有过批判,少数人进行过书院改革的某些尝试之外,真正能够体现资本主义文化并由湖南人创立的新式学堂,则一所都未出现。虽然有资料提到在 1866 年有天主教会在湖南境内设有书院一所,受业人数 35 人。^①但尚无资料证明该书院开办的具体情况与教学内容,因此也不能断定该书院就是在湖南所出现的最早的近代教育。依据湖南当时的具体情况,这种外国人办的书院要在湖南推广新式教育是不大可能的。当时任何新式的教育,只要有悖于中国传统,就无

^① 《1866 年天主教书院及学生数》,《教会新报》1868 年第 3 期。

法在湖南推行,更何况是外国人办的!教育如此,自然也谈不上政制、法制、兵制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了。总之,甲午战前的湖南文化,其各个层面都没有超越传统文化的氛围。

也许有人会说,甲午战前,湖南不是出现过几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之士吗?如魏源、郭嵩焘、曾纪泽,就连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也都大力倡办过洋务。诚然,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但人们也应看到,他们虽是湖南人,但是他们先进的思想和言行,对于甲午战前的湖南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的确甚少,故也就谈不上改变传统的湖南文化结构并促使它向近代化过渡。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因为甲午战前湖南有了这几位开风气的先人,便不顾客观存在的事实,硬要将甲午战前的湖南文化强拉入近代化的轨道。要言之,甲午战前的湖南文化,没有与西方文化发生交汇,仍属于典型的传统文化结构。而从属于湖南文化的湖南教育,也仍然还是传统的教育模式。真正的湖南近代教育,是到了甲午战后才开始出现的。

二

湖南近代教育到了甲午战后才开始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甲午战争给湖南人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冲击。心理失衡是一切变化的动因。其中以浏阳人谭嗣同体会最深。谭的一番话道出了当时湖南人普遍具有的心理落差:“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迳之气,亦顿馁矣。”^①谭说的这种“气馁”并非是在遭受挫折之后一蹶不振,而是放下虚骄的心态去冷静思考,去寻求补救的办法和措施。谭嗣同自认为找到了一种有效的办法和措施。1895年,他在写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

① 谭嗣同《浏阳兴算记》,《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4页。

痛深,乃始摒弃一切,专精致思……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① 谭嗣同的所谓“画此尽变西法之策”,就是学习西方,进行变法维新。而学习西方与变法维新,必须先从改革教育入手。

当时湖南无论是主政的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徐仁铸等,还是本籍的士绅欧阳中鹄、熊希龄、蒋德钧、唐才常、皮锡瑞等,都与谭嗣同一样形成共识。正是由于这种共识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并产生出动力,才使得湖南近代教育在甲午战后迅速兴起,才使得湖南的新政蓬勃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湖南近代教育的发轫是先有江标提倡新学,继有谭嗣同、欧阳中鹄等人创办浏阳算学社,湘乡士绅许时遂等人创办东山精舍,再有熊希龄、蒋德钧等人创立湖南时务学堂,陈宝箴改求是书院为武备学堂,王先谦变更岳麓书院课章,全省各地的士绅在本邑或建立新式学堂,或变更书院课章,或在书院旧课外增设新式学科等等。于是从 1897 年下半年到 1898 年上半年,湖南省内便出现了一场规模宏大的以创办近代新式教育为内容的兴学热潮。这场兴学热潮与湖南新政运动相伴而行,其结果是湖南教育的改革不但推动了湖南新政的进展,而且在整个新政运动期间,教育改革也成为湖南新政中成绩最为显著的一项。然而由于戊戌政变的发生,湖南新政受挫,刚刚发轫的湖南近代教育也一度停顿下来。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随即发生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继后,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被迫调整施政方针,于 1901 年宣布实行“新政”,从而使得近代教育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也使得湖南近代教育得以恢复和重新起步。其时,管学大臣

^①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 168 页。

长沙人张百熙在北京主持制订了《钦定学堂章程》，并在此基础上修订了《奏定学堂章程》，在学制上为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由于中央大规模的改书院为学堂的政令发布，以及新式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立，推动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一时间，湖南再度出现了兴学热潮，同时还出现了留学热潮。

兴学的首要条件在于师资。为了解决办学中师资紧缺的难题，湖南抚院采取了多种办法和措施。主要是派遣留学生和分中、西、南三路办理师范学堂，从而形成了湖南自己的教育格局，推动了湖南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学制有了，师资的问题也解决了，于是面向全社会的中小学教育也就提上日程。截至 1909 年止，湖南全省有中学 47 所，仅次于四川，位居全国第二。这些中学分官立、公立、私立和教会办理等多种形式，其中私立中学办得最好和最有特色的是明德、周南等学堂，不仅在省内首屈一指，而且在全国也很有名。小学教育起初未受到重视，这是因为当时的师资条件一下子还跟不上来，曾经作为权宜之计，采取过办半日学堂即半工半读的办法。到了 1905 年，省府当局认识到长此以往，对教育的健康发展不利。不少有识之士也指出小学教育乃造端之本与开化之基，不多建小学堂，则升选无资，根基不立，教育也就无法普及。于是省学务处在 1905 年后采取了积极措施，主要是从各官、私学堂师范班获有文凭的毕业生中选取学有根底的人士充当教习，在全省各县普遍设立小学堂，使得小学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到 1909 年，湖南已有初、高等小学堂共 1113 所，学生 43310 人。

湖南的高等教育是从书院改学堂开始的，以 1902 年将求实书院改为省城大学堂为其标志。随后，湖南先后开办数所高等学堂，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高等实业学堂、湖南医学堂、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湖南公立政法学堂等。

湖南在清末所办理的各级各类教育中以实业教育最为突出。

此外幼儿教育、识字教育、学会活动等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到了 1912 年民国成立,在新旧政体嬗变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教育需要,湖南的教育体制在前清的基础上进行了革新,建立了省、县两级教育行政机构。教育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学校管理、教员检定、师资队伍整顿和建设的规章、条例与细则,重新确立和完善了各项教育制度。民初,湖南各类教育在教学内容上的最大改进就是将前清读经讲经的课程取消,代之以国文,向学生传授的不再是封建性的忠君、尊孔等思想,而是共和国的民主自由思想。同时,在教育内容里还特别重视美感教育、实利教育等,从而摒弃了封建糟粕,融入了民主、科学的内涵,使之符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精神。

在新的教育宗旨和方针的指导下,湖南的各项教育在民国初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等教育方面,专门学校尤其是专门职业学校的数量明显增多。中等教育方面,在学制、学科建设上都进行了改革,显示了自己的特色,也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初等教育在民初的几年里,由于省署和各方人士的积极推动,发展较快,学校数目与在校学生人数均大量增加,在全国一直位居前列。幼儿教育方面,则显得不尽人意。大多数幼稚园主要设在城市,广大农村付之阙如。幼儿教师也相当匮乏。留学教育方面,1915 年前尚在全国较为突出,不仅留学人数多,而且在省内涵盖的生源地域也颇广泛。社会教育方面,在民初的几年间,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如讲演团、讲演传习所、半日学校、新式图书馆等均次第开办,对开通风气、传递信息、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普及和提高民众文化水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湖南教育从甲午战后步入近代化的轨道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为挽救国运,振兴中华,湖南教育界及其他各界的有识之士苦苦求索,积极宣传和提出了许多新的教育主张。其中以军国民教育思想、实业教育思想、国民教育思想为代表,它们相互